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著 钱茂伟 童杰 陈鑫 注释

国学经典

平洲古籍出版社

013025198

K092.49

02



北航

C1631956

K092.49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义/(清)章学诚著;钱茂伟,童杰,陈鑫
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11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4010 - 4

I. ①文… II. ①章…②钱…③童…④陈… III.
①文史—研究—中国—清前期②《文史通义》—
注译③《文史通义》—译文 IV. ①K092.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861 号

书名:文史通义

Wénshǐ Tōngyì

著者:(清)章学诚

注译者:钱茂伟 童杰 陈鑫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0371 - 65723280)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25.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 - 5000 册

版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文史通义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在中国史学史上，前有唐朝中叶的刘知幾《史通》，后有清朝中叶的章学诚《文史通义》，可以并称为两大史学理论代表作，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大阶段性成果。

一、章学诚其人

对于大众来说，已经过世三百多年的章学诚，是一个陌生的人名符号。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章学诚的祖籍地在会稽县道墟镇，这是一个章姓集中的村落。1950年，会稽县并入绍兴县，道墟镇划归上虞市，故而2005年在上虞市道墟镇开辟了一个章学诚纪念馆。不过，章学诚家自从祖父章如璋开始，就已经迁居绍兴城中的大禅法弄，他就出生于此。章学诚晚年归乡，“卜居城南”，以平生积蓄购得老屋数间，继续从事著述。故居在绍兴城中的塔山北麓，坐南朝北，两进三开间，前进平屋，后进楼房，辟为“瀚云山房”藏书楼，藏书五万余卷。2002年，章学诚故居已经恢复，对外开放。

绍兴是中国进士之乡，明代有“天下人才出浙江，浙江人才出绍兴”之谚，于此可见一斑。生于进士之乡，绍兴人自然热衷科举

考试。章学诚家就是一个读书家庭，经过几代积累，到了其父亲章钺时代，终于考取进士。不过，清代官场僧多粥少现象严重。章钺虽然早在乾隆七年（1742）中了进士，但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才分配到一个知县名额。于是，章学诚随父母来到了湖北德安府应城县。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客居他乡。

章学诚少时体弱多病，自称“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是个不折不扣的“笨小孩”。直到十五六岁以后，仿佛才在读书上开了窍，那时他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尽管章氏少时并没表现出过人的天赋，然其二十三岁时就已提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这样的卓见。

章钺不善做官，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就被免了官。罢官后，因家贫，竟然无法返乡，只得留居当地。章学诚虽不喜欢举业，但在当时又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乾隆二十七年（1762），章学诚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不谙世故，屡屡受挫。乾隆三十三年（1768），父亲病死。此后，全家迁居北京。乾隆四十三年（1778），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已经四十一岁。天津博物馆藏有乾隆四十三年章学诚殿试卷，上书：“臣章学诚年三十九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由副榜贡生，应乾隆四十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乾隆四十三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并所习经书开具于后：曾祖匡义，祖如璋，父钺，习《易经》。”这里提及了曾祖名章匡义，习《易经》，这是前人不曾提及的。

章学诚虽中了进士，然而自知性格与社会不合，不敢走仕途，直到逝世，都以教书、编志与著述为生。由于没有走仕途，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一生为生存而奔波。四处应聘、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不时面对家庭经济的危机。他曾在—封书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拮据：“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家有十人，

可见家庭经济压力不小。面对这样的生活，章学诚有时候感到万念俱灰，失去做人的乐趣。

不过，尽管一生都在“车尘马足之间”劳顿奔波，章学诚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他参与编修或主修过《天门县志》《顺天府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史学理论著作有《文史通义》《校讎通义》等，还有目录学巨著《史籍考》等。

嘉庆六年（1801），章学诚在穷困潦倒中结束了一生。由于贫穷，也由于不合时宜，他的著作在生前只付梓了几卷，此为《文史通义》自刻本。去世前，他曾将手稿托付给萧山友人王宗炎（1755—1826），请其代为编订。由于多种因素，王宗炎的编订工作进展缓慢。到道光六年（1826）王宗炎辞世时，完成了《实斋文集》16册。临终前，王氏将文稿归还章学诚长子。不久，又入章学诚次子章华绂手，录得副本16册。不久，又入章学诚四子章华练手，今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道光十二年（1832），《文史通义》首刊于河南开封，后人称为“大梁本”。章学诚遗稿后来为嘉兴沈曾植（1850—1922）所得。

章学诚受人重视，是20世纪的事。日本学人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曾九次到中国访问，在1902年秋访问中，内藤湖南接触到了章学诚的著作。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发表了《章实斋年谱》（1920）。日本学人关于章学诚著作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学人对章学诚的关注。胡适撰写了更为详细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文中不仅考证了章氏的生平和交游，并摘录章氏著作中的材料，对其学术思想进行阐述。梁启超虽然没有专文，但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中甚推许章学诚。上述三人登高一呼，其后学人纷纷重视章学诚研究。

学界对章学诚的重视，促进了其作品的刊刻工作。1920年，浙江图书馆根据徐氏抄本将《章氏遗书》刊刻于世。1922年，湖州藏书家刘承干从沈氏手中得到文稿，由嘉业堂出版刊行《章氏遗书》，此时距章学诚辞世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此，一位长时间不受重视的杰出学者，才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章学诚遗书》，此为目前较全之本。1993年，仓修良编纂出版了《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此为目前较全的《文史通义》版本。此外，更为全面的《章学诚全集》也正在编纂之中。

二、章学诚的学术贡献

要理解章学诚的学术贡献，得从时代学术风气的对比中加以解读。

顺治、康熙时代，学人治学有自己的学术灵魂、学术主旨，那就是经世致用。顾炎武的《日知录》从形式上看，是一部札记汇编，但其中倾注了作者的经世致用主旨。雍正、乾隆初期的全祖望，固然注重文献考据之学，但他也有其学术灵魂。但到乾嘉时代，学风明显不同，人人竞言考据，崇尚博雅，为学贪多、炫博，认为一物不知，是儒者之耻；考索只管旁征博引，不管义理当否，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让人折服；纂述只管详尽备列各说，不管有无矛盾。他们说这是王应麟、顾炎武两位大师教导的。至于王、顾的学术灵魂，他们则搁置一边。大师当年的治学手段，现在成了他们的治学目的。为考据而考据，没有更高一层的目标。章学诚虽生当乾嘉考据盛世，但却能不为时风所动，以做大学问为己任，试图找回清初大师的学术灵魂，开创新的学风。

章学诚对考据时风进行了猛烈批判。针对汉学扬扬自得的考据、博雅习尚，章学诚一针见血地说，考据不成家，博雅仅是“求知之功力”，绝不是“成家之学术”。他认为，考据、札记是治学之

阶梯，积久贯通后可以成为学问，但本身绝不是学问。博采是做学问的物质基础，但不能为博而博。想样样精通，读遍天下之书，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博必须深入到专、约，才能将所学知识串联起来，也才能有所创新。他觉得治汉学者分析过细，过于烦琐，只有一些小心得，缺乏会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在批判旧学风的基础上，章学诚明确主张改变旧学风。他对学风的演变规律作了理性的思考，认为学风的演变是一个新陈代谢过程。一个高明的学人，“不宜以风气为重轻”，而应“持世”，救正时风，创造出新的学风来。宋学空谈，但治汉学又征引太多，他的主张是兼采汉宋，“识大意”“知大体”，加强宏观性、理论性研究，从整体上去领会、把握前人著述中的精神内核，“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

章氏一生，以做大学问为己任。所谓大学问，是指在理论上有创新、能自成体系的学问。贵专家、贵创造发明，力图在理论上“自成一家之言”，是章氏治学的最高奋斗目标。从其以后的治学实践来看，章氏的奋斗目标基本实现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基础，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仓修良：《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史学是章学诚的特长。这点他很得意，自言“吾于史学，盖有天赋，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章氏史学的特点是“贵其著述成家”。提倡写著作，这是他在史学上最高明的见解。所谓著作，是指在观点、材料、体例上有独创的史著，又称“独断”“撰述”。著作是相对比次、考索而言的。比次又称记注，是指记录、选辑和汇编原始资料之书；考索就是考订、札记一类史著。这是从学术研究、学术价值角度立论的。从学术角度，将天下史著区分为三个档次，是一种十

分高明的认识。这对当时那些成天“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朴学家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章氏的著作论，为史学的科学化指明了方向。

章氏史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写著作展开的。他认为，只有史义、史德、史体、史事、史文有机结合的史著，才可称著作。他用人身比喻说：“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事、文、义三个概念，是孟子概括《春秋》旨意时提出的。章学诚借助这些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构筑了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

史义，又称史意，相当于今天所言的历史观。章氏认为“史所贵者，义也”（《中德》）。何谓义？义是“史家著作之微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是一书之“精神”。有义，“书始成家”。具体地说，高明的史义应能“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答客问上》）。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多讲史法，不太讲史义，章氏重视史义，把史义置于首位，主张以史义指导修史实践，说明到了封建社会末叶，史学的科学性已提上议事日程。

史德。史学是一种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主体素质关乎史学认识的水平，所以，传统史学自刘勰、刘知幾以来，一直重视这个问题。刘知幾有著名的才、学、识“三长”说，刘知幾以后，曾巩、揭傒斯、胡应麟等人力图完善刘氏理论，纷纷提出了“心术”“直笔”“公心”诸概念。章学诚结合当时现实，对揭、胡诸人的概念作了进一步提炼，明确提出了“史德”概念，且对“四长”位置作了重新排列，以史识、史德置于首二位，史才、史学次之。

史体。体例是反映历史内容的形式，形式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一部史著的水平。要写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著，没有好的体例

是不行的。中国传统的史体到宋代已臻完善，但没有停止史体革新的脚步。明中叶以来，史家仍在努力探索新史体，曾出现过种种新的综合性史体，只是没有为后人认可、接受而已。章学诚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史体革新者，他曾“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书而删书志之名”（《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邵二玄论修宋史书》），设计过一种新综合史体。章氏新纪传体有四部分：纪，相当编年史，是纲；传，申编年之详，用纪事本末法，或书人，或述事，灵活多变；图，专门写天象、地形、舆服、仪器等难以用文字说明者；表，排列难以稽检，难以详写的人事。章氏的新史体曾在修《湖北通志》时实践过。史料上，他提倡“六经皆史”，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报孙渊如书》）。这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

章氏贵著述，最终归结点是提倡修通史。他认为通史便于阐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他作《释通》篇，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前人对宋代郑樵《通志》议论纷纷，章氏则从郑樵承古通史家风角度，给予郑樵很高的评价。

章学诚晚年的思考进入到历史哲学思考层面，这是其伟大之处。章氏史学理论代表了中国传统封建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准。从某种意义上，他是封建旧史学的殿军。

三、《文史通义》其书

《文史通义》应是一部仿《史通》而编的、有一定体系的、能成一家之言的论文汇编。据其自己的设想，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由

于它是“文”“史”的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文史通义》的命名，先标“文史”，突出地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要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及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并且亮明旗帜，归结为“义”，即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点；其方法则是古今上下贯通，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之“通识”。由此可知，此书更像是传统国学的通论。

当然《文史通义》也有着其局限性。首先，《文史通义》为评论体，其中有些问题因立论过于偏激，言过其实之处不少。书中将郑樵的《通志》捧得过高，而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贬得过低。其次，《文史通义》没有一个严格的著述义例，大多是应时借题而作，尤其是外篇，更是以随感等形式发挥自己的学术主张，故内容庞杂，组织松弛。

四、本书选译的说明

对新手来说，《文史通义》绝对是一部难读的书，所以得有注释本作为参考。本选译正为此而设。关于本选译本，作此几点说明。

选文顺序。根据仓修良编纂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涉及了文、史、方志三大领域。

继承了前人题解传统。《文史通义全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为方便读者理解，均有题解。本书继承了他们的成果，略作简化而已。

重在解释型注释。《文史通义》的注释始于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再于严杰、武秀成《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三于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三种注释, 风格不一。《文史通义校注》偏重学术性注解, 重在让人了解典故与句子的来源、文字的校勘。这种风格是清人注释《困学纪闻》的风格。《文史通义全译》除了继承《文史通义校注》的风格外, 更重视难懂词句的注释, 这是由其普及风格决定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则偏重人名、书名的注释, 而省略难懂词句的注释。这些注释可称为学术型注释。本书是国学普及读本, 重在方便大众理解, 可称为普及型注释或消费型注释。注释的精神是“麻烦一人, 方便众人”, 得让大家读得懂。本书在以上三部注释本的基础上, 朝前走了一步, 一是保留了部分人名、书名、典故的解释, 删除了普通读者不太关注的文句来源注; 二是加强了难懂词汇的解释; 三是纠正了前人部分错误的解释。总之, 以方便初级水平以上读者阅读理解为基准。

尽量提升翻译质量。翻译是建立在内容理解基础上的, 理解越深, 翻译越好。也只有对其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才能表达出合适的意思。《文史通义全译》是目前最好的《文史通义》翻译版本, 这既提供了方便, 也出了难题。有了前人的译本, 如何再做新的译本,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从知识的生产来说, 要弄得与别人不一样, 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求异是为了表达得更为精确。追求不同, 会逼迫着人有不同的表达, 从而有可能出现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只要仔细研究, 相信是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表达方式的。对于新手来说, 必须先抛开前人的译本, 直接研读原文, 进行翻译。否则, 直接参考前人译本, 思维容易被框住, 陷入前人的成译。等翻译好以后, 才可以参照前人译本, 进行损益, 使之更好。可惜, 我们缺乏经验, 仍是走了弯路。只能在初稿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解, 力求表达的不同, 降低相似性比例。我们三人作了分工, 重新审查了初稿。最后, 我在二稿基础上, 对照《文史通义全译》, 逐字逐句地作了深入的研究, 对译文作了局部的修订,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增减词句，使之更为简练；更换表达方式，使之更为通顺；吸收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深化了部分高难度句子的翻译，提升了翻译质量；在技术层面，原文自注的翻译放进了括号内。翻译也不能完全直译，得对个别结构作一些调整。毕竟，古今汉语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完全直译，就会有一点别扭。

注释、翻译工作也是一种研究，得费时间琢磨，得参考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特别要感谢严杰、武秀成两位先生的辛勤工作，提升了学界对《文史通义》一书的理解，使本书的注译工作省了不少力气。本书的注释、翻译在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补正工作，但这些微小的新思考，必须仔细比对才会发现，在此也不能一一罗列。当然，仍有一些难点，如《书教中》之《策府议林》一书，作者与时代问题就解决不了，尚希后来者继续努力。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注释、翻译稿，仍可窥见《文史通义全译》的影子，这是我相当不安的，希望得到严杰、武秀成两位先生的谅解。

钱茂伟

2011年11月于宁波大学

目 录

易教上	15
易教中	23
易教下	30
书教上	38
书教中	46
书教下	55
原道上	68
原道中	81
原道下	88
博约上	98
博约中	102
博约下	107
浙东学术	111
文德	117
文理	122
古文公式	133
古文十弊	140

辨似	158
繁称	169
俗嫌	181
针名	186
砭异	191
砭俗	195
说林	204
知难	230
释通	238
答客问上	255
答客问中	262
答客问下	269
横通	275
史德	280
史释	289
史注	297
传记	305
文集	315
答问	324
篇卷	333
师说	340
感遇	346
方志立三书议	356
州县请立志科议	372
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	384